

沈葆楨信札考注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沈葆楨信札考注

林庆元 王道成 考注

巴蜀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沈葆桢信札考注/林庆元、王道成考注. —成都: 巴蜀书社, 2013.12

ISBN 978-7-5531-0370-9

I. ①沈… II. ①林… ②王… III. ①沈葆桢 (1820~1879) —书信集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1071 号

沈葆桢信札考注

林庆元 王道成 考注

责任编辑 黄云生
出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60mm×185mm
印 张 53.25
字 数 11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370-9
定 价 38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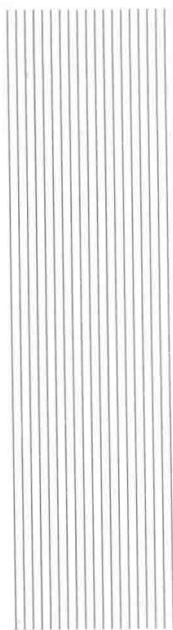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31-0370-9



9 787553 110370 9 >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戴逸 键 马大正
朱诚如 成崇德 邹爱莲

总 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缥缈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皮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渐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庋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被英法联军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迨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二〇〇四年

序

王道成

沈葆楨（1820—1879），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四年（1854），迁御史。屡上书言事，得到咸丰皇帝的赏识。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出任江西九江知府。因九江已被太平军占领，应曾国藩之邀，为管营务。咸丰六年（1856）六月，调署广信知府，随主持广信防务之工部右侍郎、江西学政廉兆纶赴府属之河口筹饷。太平军将领杨辅清率众万余，连陷贵溪、弋阳，进逼广信，官吏军民多避走。夫人林普晴，林则徐次女，刺血作书，乞援于驻玉山之浙军总兵饶廷选。葆楨闻警，兼程返郡，誓死守城。廷选得书，星夜驰援，七战皆捷。太平军死者近千人，撤围去，广信得以保全，沈葆楨亦因此而名闻天下。咸丰七年（1857），迁广饶九南道。咸丰九年（1859）六月，加按察史衔，留管广信防务。因见忌于大吏，遇事掣肘。九月，沈葆楨奏请开缺，回籍养亲，得到咸丰皇帝的允许。广信士民数千人前往省城，请求沈葆楨留任。清廷调赣南总兵饶廷选接管广信防务，沈葆楨才得以成行。咸丰十年（1860）六月，授吉南赣宁道。沈葆楨重申前请，又一次得到批准。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诏令赴曾国藩安庆大营，听候委用。十二月，由曾国藩推荐，破格委任江西巡抚。同治元年（1862）二月，又命兼管广信粮台。

这时，浙江已被太平军占领。曾国藩驻军皖南，左宗棠进军浙江。太平军将领杨辅清、李世贤则进攻江西，企图截断江西与安徽、浙江之间的粮道。沈葆楨亲赴广信主持防务。捐俸银千两，令士民凭险筑寨，实行坚壁清野。并激励主客各军阻击太平军。同治二年（1863）四月，败太平军将领黄文金于小路口，又败之于祁门。不久，浙军攻克黟县，太平军进攻江西。沈葆楨督军阻击。经过多次激战，太平军撤出江西。

同治三年（1864），清军围天京。太平军又进攻江西，牵制清军的后路。清廷令杨岳斌移师督剿，命沈葆楨会商机宜。六月，湘军攻破天京。黄文金拥幼天王洪福瑱由浙江、安徽进入江西，准备前往广东。沈葆楨令席宝田追击，大败太平军于石城。阵擒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诸王，搜获洪福瑱于荒谷中，并先后加以杀害。由于这个缘故，清廷赏给沈葆楨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加头品顶戴。沈葆楨推功诸将，上疏力辞。又以父母衰病，恳请归养。均不允。同治四年（1865）三月，母林夫人病逝，得旨赏假百日。假满，署理江西巡抚，即行赴任。沈葆楨恳请终制，得到清廷的批准。

同治五年（1866）六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于福州马尾山麓江畔创设船厂。但是，船厂尚未开工，左宗棠就调任陕甘总督。他力荐沈葆楨出任总理船政大臣，主持福州船政局工作。同治六年（1867）六月，沈葆楨到任接办，尽管事属草创，困难重重，但是，在他的主持下，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八月，他上书朝廷，对船坞、船厂、学堂、采料、募勇等方面的情况作了全面的陈述。他坚持左宗棠制定的方针，在实践中加以发展和完善。在当时，中国没有人知道如何造轮船，聘用法国人日意格为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并由他们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工匠。为了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沈葆楨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一再强调：“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原议设立学堂两所，即前学堂和后学堂，艺童六十人，后来又添设绘事院、管轮学堂、驾驶学堂和艺圃，共艺童三百余人。光绪元年（1875），沈葆楨趁日意格回国采购之便，在前后学堂中挑选出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等五名学生随同去法国参观学习。此后，先后派遣三批学生去欧洲留学，培养出一批海军将领、工程技术人才，还有学者和外交家。

随着人才的成长，造船的质量日益提高。第一、二两艘轮船万年清和伏波的轮机，都是购自外国，第三艘轮船安澜的轮机，则是由船厂自行制造。造万年清的时候，多次返工，造伏波、安澜的时候，返工的情况就一次比一次少。在海上航行，伏波稳于万年清，安澜又稳于伏波。所造轮船由木壳到铁肋，到铁甲，到钢肋钢甲，不仅吨位大增，而且炮位多，速度快。

沈葆楨主持船政局期间，不断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同治五年（1866），吴棠接任闽浙总督。下车伊始，即声称：“船政未必成，虽成也何益？”船政提调周开锡被匿名帖攻击，船政局员李庆霖又遭到吴棠弹劾，说他“专事趋承”，请革职勒令回籍。周、李二人，是沈葆楨的得力助手。去掉他们，就是砍掉沈葆楨左膀右臂，使他无法工作。沈葆楨非常气愤，上疏力争。疏中说：“船政虽系总理王大臣所奏请，而自强之道，断自宸衷。为臣子者，均宜激发天良，以纾宵旰。臣官非言责，分属部民。然船政系臣专责，生死以之。乞谕周开锡始终其事，李庆霖仍留局差遣。”清廷同意他的请求，并于次年将吴棠调走。同治九年（1870），父沈廷枫病逝，沈葆楨回籍守制。同治十年

(1871), 内阁学士宋晋上疏, 称船政“名为远谋, 实同虚耗”, 请下令停办。清廷将宋晋的奏折发给沈葆楨, 要他发表意见。他针对宋晋的论点一一进行驳斥, 并强调指出, 船政是“自固藩篱, 为民御灾捍患”的自强之道, 不能因浮言而动摇。与洋员订立的合同不能废, 购置的机器和已建成的各项设施也不能弃。船政“不特不能即时裁撤, 即五年后亦无可停”。他的意见, 得到了清廷的采纳。同治十一年(1872)服满, 仍主持船政。先后造成兵轮二十艘, 分布各海口。

同治十年(1871)十月, 琉球商船在海上遭遇飓风, 飘至台湾。船上六十六名琉球人中, 有五十四名被牡丹社番杀害。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 日本以琉球人民是日本属国人民为借口, 出兵侵台。三月, 日军在琅琦登陆, 进攻牡丹、高士滑等番社。清廷闻讯, 任命沈葆楨为钦差大臣, 办理台湾等处海防, 兼理各国事务。沈葆楨奏请将日本侵台事件照会各国领事, 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购买铁甲船二艘以及充足的巨炮、水雷、洋枪、子弹、火药、煤炭等物, 加强战备; 储备军事、外交人才, 以应对战争和对外交涉; 敷设由福州陆路至厦门、由厦门水路至台湾的电线, 使消息瞬息可通。他的请求, 全部得到清廷的采纳。五月四日(6月17日), 沈葆楨到达台湾。五月九日(6月22日), 命福建布政使潘霨、台湾道夏献纶和洋员日意格等携带由他起草的照会前往琅琦, 与日军司令西乡从道谈判。照会中明确宣布: “中国版图, 尺寸不敢与人。”与此同时, 他采取了一系列的备战措施: 在安平海口修筑炮台, 安放西洋大炮; 从大陆调派提督罗大春等率军镇守淡水、宜兰、基隆; 商借南北洋洋枪队五千人, 驻防台湾; 办理南北乡团, 保卫地方; 调拨船政局及沪局轮船, 加强台湾海峡的巡防和闽台之间的联系。八月十八日(9月28日), 提督唐定奎率铭军洋枪队十三营共六千五百人先后在旗后登陆, 大大加强了台湾的防御力量。这时, 侵台日军中瘟疫流行, 死亡颇多, 士气低落。日本政府派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到北京与清政府谈判, 要求中国赔偿军费, “索洋银五百万元, 至少亦须银二百万两, 不能再少”。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仅同意对受害者酌量抚恤。英使威妥玛从中调停, 清政府同意偿银五十万两, 其中十万两用于对遇害琉球人的抚恤, 四十万两用于对中国愿留以自用的日军在台修建的所有道路、房屋等的补偿。九月二十二日(10月31日)中日签订《台事专条》(亦称《北京专约》), 十月二十五日(12月3日), 日军带着573具尸体(其中战死者12人, 病死者561人)和17名伤兵撤出台湾。

日军撤出后, 台湾的善后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沈葆楨认为, 台湾孤悬海外, 是东南七省的门户。形势扼要, 物产富饶, 久为异族所垂涎, 台湾的善后问题, 不能稍缓。台湾幅员辽阔, 延袤千有余里, 但是, 由清政府官员管理的只是滨海平原的三分之一, 其余都是番社。因此, 开山和抚番必须同时并举。“务开山而不先抚番, 则开山无

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先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要开山，就必须屯兵卫、刊林木、焚草莱、通水道、招垦户、给牛种、立村堡、设隘碉、致工商、设官吏、建城郭、设邮驿、置廨署。要抚番，就必须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修道途、给茶盐、易冠服、设番学、变番俗。他命台湾道夏献纶、提督罗大春负责北路，同知袁闻柝、总兵张其光负责南路，总兵吴光亮负责中路。披荆斩棘、锤幽凿险，冒暑犯疟，历尽艰苦。北路，自苏澳至歧莱，开路 205 里。南路，一自赤山至卑南，开路 175 里；一自射寮至卑南，开路 214 里。中路，由彰化之林圯埔而东至璞石阁，开路 265 里。

沈葆楨的开山抚番，重点在东部。因为，西部平原多半为移民开发，而东部山地尚属番社。旧例：禁台民私人番界，亦不许内地人民偷渡到台湾。但是，“欲开山，不先招垦，则路虽通而仍塞；欲招垦，不先开禁，则民裹足而不前。”为了巩固开山的成果，沈葆楨奏准，将一切旧禁予以废除，并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内地人民到台湾开发。

台事粗定，而船政急待报销。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沈葆楨回到福州。他刚刚离开，狮头社番就狙杀游击王开俊，琅璠各社亦有异心。光绪元年（1875）二月，沈葆楨再次赴台。派遣提督唐定奎率所部铭军伐木开道，连环而进。四月，攻破竹坑、本武及内外狮头等社，胁从各社，次第就抚。七月，唐定奎部十三营撤离台湾，返回江苏。

此前的台湾，只是福建省的一个府，下设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淡水、噶玛兰二厅。经过实地考察，沈葆楨认为，当时的台湾，可以建府的有三处，可以建县的有十余处。如果另建一省，条件还不成熟。他奏请将琅璠增设为恒春县，并增设台北府，下设淡水、新竹、宜兰三县。为了加强管理，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他的建议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光绪元年（1875）四月，沈葆楨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沈葆楨以才不胜任，上疏力辞，不许。七月，回到福州，清理船政，以待替人。十月，赴两江就任。两江原是富庶之区，但是，由于长期战争，土地荒芜，民生凋敝。省城南京的居民，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二三，“茅舍竹篱，居其大半”。加以粮食欠收，哀鸿遍野。拐卖妇女的现象非常严重，江北命盗重案，每天都在发生。民间秘密结社十分活跃，十二圩一带，哥老会十数万，安清道友亦十数万。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他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莅任三月，诛戮近百人”。沈葆楨知道，严刑峻法，只能治标，根本的问题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他鼓励江北人民到江南开荒。把水利建设看作“农政之原”，是“当今第一要务”。他不仅亲自抓计划、抓经费，而且亲自出面协调运送石料的船只。蝗灾发生的时候，他要求地方官组织农民捕蝗虫，挖蛹子，准作正开销，并要

求各地勇营积极参加。他还提倡积谷，以应对灾荒。淮盐是两江的重要产业，但是，十几年前，由于川盐进入湖北，淮盐引地缩小，造成产品大量积压。沈葆楨从提高淮盐的质量着手，同时与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反复函商，淮盐的销售状况得以改善。鸦片战争后，国内的一些地方开始种植罂粟，两江也出现了种罂粟的“烟户”。沈葆楨深知鸦片危害，力主查禁。但是，他的主张不仅遭到“烟户”的反对，而且遭到官员们的反对。沈葆楨的态度却十分坚决，他说：“罂粟痼疾，深中膏肓。非拼着载道怨声，无从挽救。”“罂粟拔本塞源，除恶务尽。眼前则怨声载道，将来即无量功德。”在他的坚持下，禁罂粟终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时的两江，财政非常困难。由于洋票的流行，同治十三年（1874），两江厘捐骤减五六十万两。但是，户部一方面要求两江承担各种名目的外饷，另一方面却以危词胁迫两江开关。沈葆楨认为，如果开关，“将尽驱商民而纳诸洋票”，“大局立形决裂”。他上书朝廷，请求从缓，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两江有勇一万余人，户部以节饷为理由，要求裁撤。沈葆楨认为，若为地方起见，区区万余人尚不敷布置，怎么能裁撤呢？光绪三年（1877），由于裁减淮军，两江“抢案层见叠出”。如果勇营与淮军并裁，居民必不堪命。更何况所省之饷，仍是竭于外输，对本省没有任何好处。“万一莠民因而生心，各省饷源立断，大局何堪设想！”他上书朝廷，请求保留勇营，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沈葆楨治军，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他认为：“此辈令其闲坐，则枝节横生。使之习勤，兵民即休戚相关。且身劳日健，亦无形之操练也。”两江勇营的职责，不仅是维护地方的治安，而且参加地方的建设和救灾。发生水灾，勇营参加护堤抢险；发生蝗灾，勇营参加捕蝗、挖蛹；建设水利工程，勇营参加挑河、筑圩。“捕蝗、挖蛹，按斤给赏。挑河、筑圩，每人日添食米一升。”所以，勇营也“颇踊跃用命”。不仅勇营受到了锻炼，兵民关系也得到了改善。

沈葆楨重视“内治”，也非常重视“外防”。他认为，“西洋或隐忍幸和，东洋则终须一战”。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本的对外扩张，值得忧虑；日本被俄国吞并，更值得忧虑。中国当时的兵轮，只能防守海口，不能出海作战，必须建立一支拥有铁甲舰的外海水师。有了铁甲舰，才能使入侵之敌无从登岸，现有的兵轮，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为了更快地建成一支外海水师，使各省均有所恃，沈葆楨上书朝廷，请求将光绪元年（1875）议准的由户部每年拨给南北洋海防经费各二百万两全部解归北洋。光绪五年（1879），日本吞并琉球，进一步暴露了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沈葆楨认为，各省兵轮，分布各海口，一旦发生战争，不能协同作战。他奏请将各省兵轮间月调赴吴淞，由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督率操练。操练完毕，仍回原处。什么地方有外敌入侵，这支水师立即奔赴前线。他的建议，也得到朝廷的批准。

沈葆楨十分重视官吏和将领的选拔和任用。“属吏有不称职者，劾去之，贤能著绩

之员，则推心置腹，不少掣肘，人忘其劳。治军严而有恩，自统将及士卒咸乐尽死力”。经过几年的整顿，两江的吏治民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沈葆楨的健康却每况愈下。他就任两江总督的时候，虽然才56岁，却已须发俱白，闻言辄忘。每到秋天，就出现咳嗽、呕吐、腰疼等症状。光绪元年（1875）十月，他在赴任的途中，溯江而上，阅看吴淞、江阴两处炮台。经过焦山时，因咳嗽、呕吐，不能上岸。到了南京，“骤当秣陵风雪，尤剧不可支”。“只能坐而不能行，苦难言状”。但是，刚刚到任，又不便请假，只好勉强支持。光绪二年（1876）三月，情况有所好转，但畏寒特甚。别人已换春衣，他还身着重裘。刚刚入秋，他就穿上棉衣，咳、喘、腰痛等症状又相继出现。到了冬天，更不得不闭门谢客了。他为自己的不能恪尽职守，负国负民而深感内疚，曾两次奏请开缺。但是，清廷只同意他短期休假而不同意他辞职。光绪四年（1878）冬，虽然天气暖和，他却不仅咳、喘，而且腹泄两月有余。光绪五年（1879）四月，入京觐见，慈安、慈禧两位皇太后四次召对，语以“时事艰难，勿萌退念”。此后，他就不再以病请辞。十月十六日（11月29日），沈葆楨卒，享年六十。追赠太子太保，谥文肃。其奏稿、诗文，分别收入《沈文肃公政书》、《夜识斋剩稿》、《船司空雅集录》等书，刊刻行世。

沈葆楨还留下许多信札。有写给亲属的，也有写给同僚和朋友的。现在保存在福建省图书馆的《沈文肃公家书》和《沈文肃公牍》，就是沈葆楨死后，由别人收集编纂而成的。

《沈文肃公家书》是螺江陈宝琛家藏本，其封面及扉页均写有“螺江陈氏抄本”字样。《沈文肃公牍》的扉页盖有“沈氏农苏珍藏”印。农苏，即沈覲宪，系沈葆楨的第五代孙。可见这一抄本是沈氏后代收藏的。1997年，福建文史馆将二者合为一书，交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则是福建省图书馆藏《沈文肃公家书》和《沈文肃公牍》的传抄本。在抄本、传抄本和影印本中，影印本是目前较好的版本。

影印本《沈文肃公家书》收入信札二百五十九件，约六万余字。《沈文肃公牍》收入信札一千余件，约二十九万字。但是，家书部分没有沈葆楨在北京任职期间和在福州任船政大臣期间的信札。公牍部分，则仅限于同治十三年（1874）巡台之后。此前的信札，一概没有收入。而南京图书馆藏耆龄、沈葆楨撰《江西盐饷禀稿》中，却有沈葆楨的公牍十件，在近代名人墨迹或名人书信集中，也收入了少量的信札。还有一些信札，可能散存于大陆和台湾的一些图书馆中。

沈葆楨的信札，只写受信人的字、号或职衔，绝大多数没有撰写时间。在谈现实问题的时候，往往借用古人、古事、古语。他给别人写信，都用行草，他希望别人给他写信也用行草。光绪二年（1876）闰五月中旬，他在《复冯焄光》一信中说：“此后来信，

只求行书，期于详尽而已，虽极草率不妨。”光绪四年（1878）六月下旬，他在《复庞际云》一信中又说：“此后如蒙手札，乞用行草。不多费时刻，且能详尽。弟前在曾文正公麾下，有所陈请，从未作过楷书。非示脱略，求速也。”对上级有所陈请，都“从未作过楷书”，对同僚、朋友和亲属，更不可能不用“行草”了。由于以上原因，给我们今天的读者造成了种种困难，以致这一珍贵的史料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20世纪80年代，林庆元先生在撰写《福建船政局史稿》时，第一次发现并利用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沈文肃公家书》及《沈文肃公牍》的传抄本。90年代，林先生在撰写《沈葆楨大传》时，《家书》和《公牍》又成为《大传》的基本史料。在利用的过程中，加深了他对沈葆楨信札的史料价值的认识。他将《沈文肃公家书》、《沈文肃公牍》影印本以及他多年来从国内的其他图书馆、博物馆收集到的若干信札，重新进行编排、标点，考订其撰写时间，并对信札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简要的注释。有的地方，还进行考证，纠正了信札中的讹误，为沈葆楨及其时代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是近年来沈葆楨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成果。经过作者多次修改，书稿的质量日益提高。不幸的是，书稿尚未杀青，林先生就和我们永别了。为了使《沈葆楨信札考注》这一已经列入清史纂修工程的项目不致功亏一篑，我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的委托，负责完成林先生的未竟之业。限于水平，一定存在着许多缺点甚至错误，敬希海内外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2008年7月14日

凡例

一、本书收集的沈葆楨信件，包括他任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及巡视台湾各时期的信件。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中国近代工业的诞生、中国近代学校及近代海军的创办等，沈葆楨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这些信件均有所反映，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台湾地方史的十分重要的资料。

二、沈葆楨信件大多来自福建省图书馆藏的《沈文肃公牍》及《沈文肃公家书》。编者还从国内其他图书馆、博物馆收集到若干信件，与前者重新编排，定名为《沈葆楨信札考注》。

三、《沈葆楨信札考注》的主要读者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和爱好者。考的范围是信的撰写时间；注的范围是信里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至于其中的字义、成语、典故、诗赋，不列入考注范围。

四、沈葆楨书信中使用不少古字或罕见字。为了读者方便，本书以简体字排印，但也视情况保留个别古字或罕见字。

五、沈葆楨原信极少被发现。目前笔者看到的只有沈葆楨少数原信的复印件。有的信函已有标题，无标题的，由编者加上。

六、沈葆楨家书抄本字迹潦草，少数字无法辨认，少数信件已被虫蛀。字迹无法辨认者，则用□标出；可以肯定的错字、别字，用（ ）标出；脱字、衍字分别用[]和< >标出。

七、出注原则：信中涉及的人物及受信人，一般作注。有些人物生平不详，且非重要人物者不注。

八、信中涉及的人物，第一次出现的作注，以后出现的不注或简注。以后以字号、职衔出现的，则注明姓名，不简注。

九、所收各件，凡未注明来源者，均见于《沈文肃公牍》、《沈文肃公家书》。其他均于右下方注明来源。

十、本书抄本的标题，凡用收信人字、号、职衔者，一律改为收信人的姓名。

十一、本书附录林庆元所撰《〈沈文肃公家书〉若干问题的考证》、《〈沈文肃公牍〉（影印本）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考证》，以供参考。